

严绍璎 著

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

——
严绍璎海外访书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严绍璁 著

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

——
严绍璁海外访书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璿海外访书志 / 严绍璿
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5

(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ISBN 7—5325—3984—9

I. 日... II. 严... III. 古籍—善本—研究—中国
IV. G2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107 号

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

——严绍璿海外访书志

严绍璿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总发行所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上海颀辉装订厂装订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875 插页 8 字数 408,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50

ISBN 7—5325—3984—9

K·679 定价: 49.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主 编

王 勇

学术委员会

主 任：严绍澍

委 员：马兴国 王 勇 王宝平 王金林
王晓平 王晓秋 卞崇道 汤重南
严安生 张 竞 陈振濂

运营委员会地址：310028 杭州市天目山路 34 号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联系人：吕顺长

周易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乾上乾元亨利貞



正義曰乾者此卦之名

掛也言懸掛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卦象二畫之

體也象陰陽之氣未成萬物之象未得成卦必三

畫以象三才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乃謂之

卦也故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恒初

有三畫雖有萬物之象於萬物變通之理猶有未

盡故更重之而有六畫備萬物之象形象窮天下

能事故六畫成卦也此乾卦本以象天乃積陽

陽氣而成天故此卦六爻皆陽畫成卦也此乾

足利學校遺迹圖書館藏南宋初刊本《周易注疏》(日本国宝)，宋人陆游家藏本(1998年遺迹圖書館惠贈著者書影)



李太白文集卷第一

草堂集序

宣州當塗縣令李陽冰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暉九世孫蟬聯
珪組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爲名然自
窮蟬至舜七世爲庶累世不大曜亦可歎焉神龍之
始逃歸于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
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
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
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已來風騷之後馳驅
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
岳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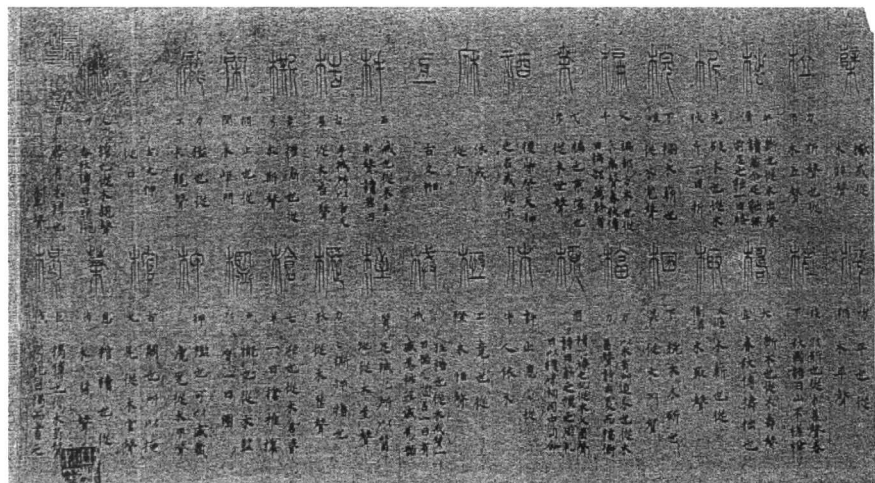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一

老泉先生

論

易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
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
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
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
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
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



杏雨书屋藏唐人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本)(日本国宝),宋内府藏本(1985年杏雨书屋主任羽田明先生惠赠著者书影98帧之一)

播祭森，多於蜀女上何曾見唐
 本吳君一卷頗殊奇傳寓云自
 元和時問君此卷有何珍佩傳
 蘇梅鍾美人君言是物少微談
 殘笑點蹙不神神家密知貴
 錦裘陋巷誰後情恭中影和
 令君抄贈我始吐先惟千星辰
 許書省存二百字古鏡一瑤千年
 塵篆文已與流俗殊經說尤全耳
 目彰軋嘉老儒耽蒼雅東南巖
 段并絕倫就中一字百搜討詰難
 壽起何斷一晤与此幸相肖吳古
 轍正合今時輪乃知二徐由曲弄
 貽誤我智從因循我國此言神一快有
 似杜楊拙馬所我替趨朝陸歷尹
 類定大書醫碩泰四海千戈驅迫
 忙十年辭肉消虛盡却思南閩老
 紫証舊學於我後何有當清齋
 天淨梳妝瑤云瑤閨戶誰凡影
 同治三年八月作此詩廬
 千促尋元雅屬去年八月曾國藩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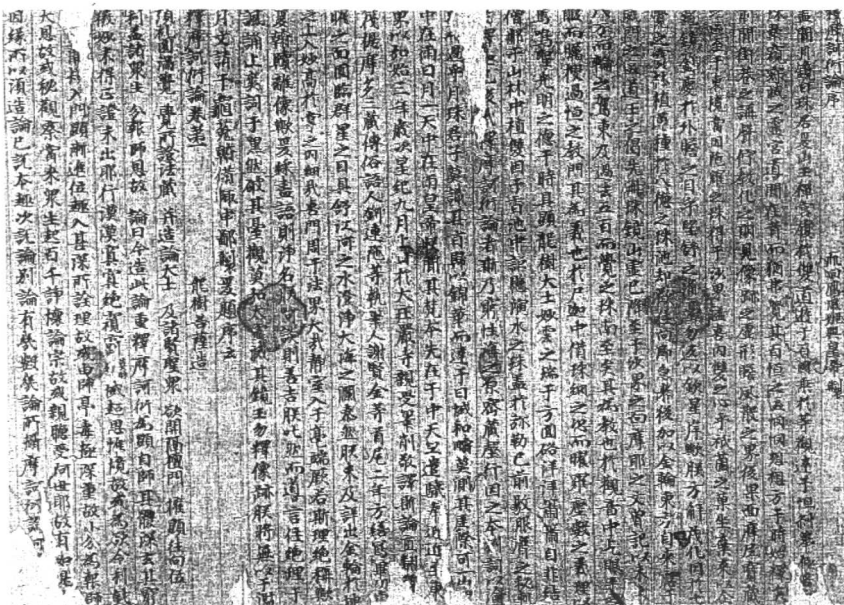
杏雨书屋藏唐人写本《说文解字》(残本)卷尾清人曾国藩题诗(1985年杏雨书屋主任羽田明先生惠赠著者书影98帧之一)

井二
居士
手裝
明治
二年十月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諱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太王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身斷髮示不可用其身以象龍子故不使傷害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句吳太伯居地名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卒仲雍嗣其後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宋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康仲於周之北故夏虛餘曠曰是為康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疆鴻美立疆鴻美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繼立周繼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城周圯虞公以圖周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



石山寺藏唐人写本《释摩诃衍论》(日本国宝)(2002年著者重访石山寺时购得《石山寺宝物篇》一册,此为其中书影之一)

总 序

王 勇

展呈在您面前的这本著作,是“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中的一种。这套文库诞生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每部著作都凝聚着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同时寄托着对未来的憧憬。我们期盼在国际化进程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些著作会给您带来知识的愉悦和人生的启迪,希望您长久地喜欢她、呵护她。

中日两国的交往,就正史而言,始见于《汉书·地理志》,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长期以来,日本以汉字为媒介,如饥似渴地汲取中华文明,由此积淀而形成自己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构成日本传统文化之基调,直到今天依然生生不息。如此持续而密切的中日文化关系,涉及到人文社科领域的方方面面,虽然前人对此进行过辛勤的耕耘,然而还有大片处女地有待开垦。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涌现出一批根基扎实、视野开阔的学者,尤其在中日关系史领域,整体上已处在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将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时公诸于世,是本套文库的宗旨。

日本文化的生成变迁,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因素。就

外部原因而言,除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之外,还涉及到朝鲜、西域乃至欧美诸国。事实上,7世纪以前,日本主要通过朝鲜半岛摄取中国文化,整个东亚构成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文明环流圈;16世纪以后,先是葡萄牙、荷兰等,继而美国、英国等自西徂东,将日本卷入东西文明交汇的漩涡之中。有鉴于此,包含日本在内的东亚文化及东西文化关系的研究,亦纳入本套文库之主题。

这套文库从2000年7月开始筹划,计划出版40~50种。为了确保文库的学术权威性,我们聘请若干名专家学者组成学术委员会,负责审查鉴定申请资助的书稿。有关具体的申请事宜,可向“深见东州中日文化研究出版基金”运营委员会索取资料。

我们感谢世界艺术文化振兴协会(Th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rts and Culture)会长深见东州先生慷慨解囊,为本文库设立出版基金。深见东州先生本名半田晴久,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著名的国际慈善家、多才多艺的艺术家。深见先生酷爱中国文化,从他的数十部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儒学和佛学均有相当造诣。

1998年,我应邀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从事遣唐使研究,经畏友梅田善美先生介绍与深见先生相识,此后在学术会议上多次见面晤谈。当他得知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日本文化研究著作因经费等原因而无法出版时,主动提出设立基金以光大学术。对他的这种“中国情结”和对学术研究的理解,我们除了表示感谢和敬意之外,唯有把这项事业做好,以不负国际友人的初衷和国内学者的厚望。

上海古籍出版社毅然接受这套文库的出版;副总编张晓敏先生亲自参与策划,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2001年5月佳日

序

章培恒

严绍璁教授与我相交二十年了。他以中国古典文献学为基础,进而研治中日比较文化,在这两个学科领域都有杰出成就。我很钦佩。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我所佩服的学者,我在交往时一般比较谨慎。因为虽然已经到了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岁,心还未被治得符合规范,意有所不慊,不免信口放言,杂以讥弹,不仅为乡愿所憎恶,有时也使谨严的学者皱眉。对于前者,我自然我行我素;对于后者,我却不想使他们无端不快,在言谈上也就比较注意。但与绍璁先生谈天却可畅所欲言,不必有所顾忌。所以虽然他在北京大学执教,我在复旦大学任职,每年相见最多只一二次,但每次相见必聚谈甚欢。

那么,谈些什么呢?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常对“世风日上,人心渐古”的一些现象不胜欣忭而已。例如,某市区在组织小学生诵读经书;某地某校向学生提倡孝道,效果极好,现正在该地区的其他学校推广;某先生根据汉字的字形以解说字义,已达到了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以前的“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的境界,被某市某小学特级教师誉为古今最伟大的文字学家……见于报上的诸如此类煌煌记载就常成为我们的谈资。但以上所举例子,有些——甚或全部——也许是我与其他朋友闲谈时

说起的,跟绍塋先生倒没有提到过;因为此类琐事实在难以记得真切。只是我们所感兴趣的,大抵也就是这类话题而已。

当然,有时也谈学问。我所从事的专业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就这学科在 20 世纪的发展来说,受日本中国学的影响极为深厚。我国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著作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其中虽也有部分地吸收了西方文艺观的,但此种吸收又以在这以前已经接受了西方文艺观的日本为中介。尽管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的近三十年间,曾不断批判本国和外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但这种影响已深入根底,怎么驱除得尽? 举例言之,鲁迅先生在 1927 年的一次讲演中曾说到魏晋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这看法为中国治文学史者所普遍接受,即使在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也没有受到批判;但这并非鲁迅的创见,而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只不过鲁迅的那次讲演虽有不少精辟的意见,却并不是专门的学术报告,而是一种普及性的介绍,他没有——也无必要——举出此一见解的出处而已。所以,在我看来,不对 20 世纪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文化背景有相当了解,是很难弄清楚我国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来龙去脉及其得失的;而要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推向前进,又非对 20 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加以总结不可。换言之,中日比较文化研究固然有其自身的目的——究明中日文化的异同,对许多相关学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即是其中之一——也有很大助益。至于这类研究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则是毋庸置疑的事。也正因此,我对绍塋先生所做的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中日比较文化研究深感兴趣,常与他谈及这方面的问题,并很受启发。

然而,“幸乎,不幸乎”,此种请教式的谈天竟受到绍塋先生的谬许,命我为他的大著《日本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塋海外访书志》写序。这真把我吓了一跳。我在古典文献学领域本就所知甚少,在中日比较文化研究领域则连是否够得上做绍塋先生的学

生也很难说,哪担得起写序的责任?但既是多年老朋友,又无推辞之理。只好硬着头皮,以读后感冒充序言,聊且塞责。

在古典文献学领域,对日本所收藏的大量珍本汉籍加以调查、著录、介绍,甚或选择一部分在国内影印出版,是清末以来就有若干学者在陆续从事,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很有贡献,因而很值得感谢的工作;其关注的重点则在于这些珍本汉籍本身。而今绍塋先生的这部著作,在关注这些珍本汉籍的同时,又进而关注它们被收藏的不同过程、动机以及收藏单位的情况与沿革,从而由一个角度反映了日本文化的特征、理念及其演变。此书的副标题《严绍塋海外访书志》所体现的就是其前一种特色——对汉籍珍本本身的关注;在这方面,绍塋先生对其所著录的书籍的介绍之扼要、中肯且细致,读者只要稍加翻检,就会了然于心,不必词费。至其后一种特色,却须稍加说明。这里且举出两点及其相应例子,以见一斑。

一是从对收藏情况的介绍中显示出日本在该历史阶段的文化特色。书中对属于三菱财团的静嘉堂购藏归安陆氏书籍的描述就很具代表性。假如说,日本以前的珍视和大规模收购汉籍是由于对汉文化的崇奉,那么,在“脱亚论”兴起、资本主义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的时代,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弄潮儿的三菱财团为什么在1907年还要以重资购买归安陆氏皕宋楼、十万卷楼和守先阁的藏书呢?绍塋先生对此的介绍,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日本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对作为亚洲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到底采取了怎样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基于怎样的理念?其实际效果又如何?假如再以此与20世纪中国的有关情况相对照,我想也正是中日比较文化研究的一大课题。

二是在对中国古籍流入日本情况的介绍中包含着相关的日本文化风气的提示。如在介绍静嘉堂文库所藏北宋刊本《李太白文集》时,就叙述了李白集在日本的流传概况:“从时间上说,李白文

学影响日本文学创作层面,大约要晚于刘梦得、元稹、白居易等”,“从日本的五山时代(1192—1573年)禅宗寺庙的汉文学开始”才有李白影响的明显迹象可见。“此时,在日本的汉文学中,白居易文学的影响开始衰退而李白杜甫辈开始升温”。“江户时代(1603—1867年),李白文学的传播从寺庙走向世俗”。堀杏庵(1584—1642)、田西元高(1751—1824)等人的诗中都可看到李白的影响;“江户时代中期杰出的汉文学家祇园南海(1676—1751)则推崇李白,并有自比之意”。从这些情况“大致可以窥见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文学在日本列岛传播的路径”。接着,作者把李白集的传入日本与这种文学风气相联系,进而指出:“这一时期世俗知识分子对李白文学的青睐,造成中日书籍贸易中‘李白文集’多少也成为热门的商品。”并据《商舶载来书目》等的记载,列举了1758、1759、1760、1846、1849、1853年的李白集进口情况,1759年的进口竟达十五部之多。这也就清楚地说明了作者所注意的已不仅是在日本保存了多少李白集珍本及其版本情况,而且把李白集的传入过程与日本文学风气的相应变迁联系起来考察,这就进入了中日比较文化研究的领域;尽管绍塋先生对此所作的叙述相当简略,但我想是可以以此为基础而发展成为一篇具有新意的专门论文的。

诸如此类的例子,在书中随处可见。正因如此,这部书不仅在古典文献学领域有其重大贡献,更为中日比较文化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径路,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大推动作用。我得以以为这样一部必然能传之后世的著作写序,实在深感荣幸;但作为序言,我的上述文字只不过是鱼目混珠,这是要请绍塋先生与读者诸君鉴谅的。

著者叙说

中国文献典籍东传日本列岛,依据目前的研证已经有近二千年的历史,其间,经由人种的迁徙,贵族知识人的寻访,僧侣的求法问道,商人的贸易等等的通道,络绎不绝。9世纪末日人藤原佐世奉命在皇宫庭院失火后的余烬中编纂残存的典籍目录,题名为《本朝见在书目录》。其著录汉籍 1,568 部,凡 17,209 卷^①。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隋书·经籍志》著录当时国内所存典籍为 3,117 种,《唐书·经籍志》著录当时国内所存典籍为 3,060 种。如果与《本朝见在书目录》相对比,那么,在 9 世纪后期,《隋志》著录的 50%、《旧唐志》著录的 51.2%,此即当时中国国内所存文献典籍的一半已经传入了日本,并被保存在皇室与中央各个机构中,而这个统计数字又是在经历了火事之后进行的,因此原藏书量一定是超过了这个数的。这在 9 世纪时代的世界文化史上,实在是一件让人感到无比惊异的文化事实!到了 18 世纪,当时清代所保有的文献典籍的 70%—80% 便已经东传日本了。汉籍向日本传递的此种势态,无论就其历史的久远,抑或是规模的宏大,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仅见的。它构成了中日两大民族独特的文化关系,从而共同创造了古代东亚辉煌的人文景观^②。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浙江大学王勇教授倡导东亚“海上书籍之路”的论说。他认为,连接亚欧的“丝绸之路”固然是传递古代华夏文明的伟大的通道,但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上,与传递物